

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

陈洪 著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中国古代小说 艺术论发微

陈 洪 著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

陈 洪 著

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八里台 南开大学校内)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南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25

字数: 132千 印数: 1—4,000

统一书号: 10301·39 定价: 0.94元

目 录

绪论	中国小说评点之源流·····	(1)
内编	假事真情·····	(21)
	因缘生法·····	(27)
	事为文料·····	(41)
	化工肖物·····	(49)
	趣为第一·····	(55)
	同而不同·····	(61)
	囫囵不解·····	(65)
	人各有当·····	(76)
	背面铺粉·····	(83)
	衬染之法·····	(88)
	画家三染·····	(94)
	正笔奇笔·····	(100)
	舒气杀势·····	(107)
	弄引獭尾·····	(111)
	叙事养题·····	(117)
	犯中求避·····	(121)
	缓中生急·····	(126)

鸾胶续弦·····	(130)
偷笔之法·····	(136)
重作轻抹·····	(140)
实以虚行·····	(144)
逆法离法·····	(151)
外编 《水浒传》李卓吾评本真伪辨·····	(155)
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的象征传统·····	(169)
后记 ·····	(193)

绪 论

中国小说评点之源流

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并无鸿篇巨制，其表现形式主要为评点与序跋。而对小说艺术特征、艺术技巧的探索、分析，则大多集中在小说评点里。故本书在剖析若干小说艺术论命题之前，拟对中国小说评点之源流做一番勾勒、辨析的工作，先为读者呈现一幅鸟瞰草图。

评点，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有形式，包括圈点、眉批、夹批、回评、总评等。评点本用于诗文，为阅读时的随笔、心得，其初并无公诸世人之意，正如清人张潮所言：“触目赏心，漫附数言于篇末；挥毫拍案，忽加赘语于幅余。或评其事而慷慨激昂，或赏其文而咨嗟唱叹，敢谓发明，聊抒兴趣，既自怡悦，愿共讨论。”^①这段话可视为“评点通论”。由“自怡悦”到“共讨论”，评点便逐渐出现在刊行的书籍中，而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，古文、时文、诗歌、笔记小说、白话小说，乃至剧本等等，都出现了评点的刊本。而其中最富于理论价值的便是小说评点。然而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小说评点被多数研究者冷落，甚至被视为“野狐禅”。近年来，这种偏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，不少研究者开始在小说评点中披沙拣金，某些具体的研究已

① 《虞初新志·凡例》

相当深入。但宏观地把握这一批评方式，探究其盛衰流变，似尚嫌不足。

叶德辉曾在《书林清话》中谈及评点的早期刊本：

刻本书之有圈点，始于宋中叶以后。岳珂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有‘圈点必校’之语，此其明证也。

……刘辰翁，字会孟，一生评点之书甚多。同时方虚谷回，亦好评点唐宋人说部诗集。坊估刻以射利，士林靡然向风。

叶德辉所述，可注意的有两点：一是方回“好评点唐宋人说部”，二是刘辰翁“评点之书甚多”。方回为江西诗派的殿军，以选评《瀛奎律髓》著称。该书形式上已近于后世评点，而内容散杂不一，实为诗话的变体。惜其所评“说部”已不得见，否则对小说评点之探源当有裨益。刘辰翁既是评点史上的第一位大家，又是小说评点的开山祖师，其《世说新语》评点实为小说评点的滥觞之作。

刘评《世说》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：辨虚实、释因果与史论式的是非论断。其形式则灵活而随便。它对后世小说评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如刘评中“以此为达，可笑！”

“溪刻虽不可知，要是苦语。”“‘箕在釜下’十字自然，不待下句。妙！妙！”等批语，在后世李卓吾等人的小说评点中常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。不仅这种随便的方式、显露的语气影响很大，而且史论式的内容也成为后人评点小说的规范。如果着眼于理论价值，刘评同样不可忽视。《世说》卷八有庾亮讥讽陶侃俭嗇事，刘辰翁批道：“小说取笑，陶未易愚。”卷六有魏武捉刀事，结末追杀匈奴使者，刘评曰：“谓追杀此使，乃小说常情。”都是着意指出小说

的虚构特征。卷八描写桓温野心有一段生动的文字，刘评曰：“此等较有俯仰，大胜史笔。”所谓“俯仰”，指原文中对桓温行为与心理的描写，即始而“卧语”，“既而屈起，坐曰”等处。他认为这种故生顿挫、以求曲折的艺术笔法与史笔不同。注意到同为叙事之作的小说与史籍之间存有界限，这在我国小说理论史上是应该书上一笔的。当然，刘辰翁的评点十分简略，理论表述亦模糊，但筌路蓝缕之功终不可没。

刘氏之后，小说评点沉寂了三百余年，至明季而勃兴，然后有延续两个世纪的黄金时代。这个黄金时代大致经历三个阶段：由万历中至明末为一阶段，小说评点迅速进入繁盛期；清初至乾隆为又一阶段，小说批评的理论倾向发生根本转变；嘉、道以后为第三阶段，小说评点由盛转衰，数量未减，而理论水准明显下降。下面就其概貌与承转契机分别加以辨析。

万历年间，最早的评点本白话小说为余象乌所评《新刻按鉴全象批评三国志传》。此书刊于万历二十年，题署为“书坊仰止余象乌批评”、“书林文台余象斗绣梓”。余象乌本为书贾，亦粗知文墨，他的评点为纯史论式，只谈书中人物行为的优劣得失，并不涉及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。万历二十一年，又有《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》刊行，题署“陈氏尺蠖斋”。内容与余评相类。二书皆只有眉批，每条批语亦极简略。但后者卷首有尺蠖斋的序，表明了评点宗旨，值得注意：

载攬演義，亦頗能得意。獨其文詞時傳正史，
干流俗或不盡通；其事實時采謠狂，于正史或不盡

合。因略缀拾其额，为演义题评。

可见当时的小说评点者只是着眼于文字诠释，史实辨证而已。次年，余象斗又刊行《忠义水浒传传评林》，上有余宗的眉批。余象斗、余宗都是余象乌的别名。余宗的批语水平也不高，但余氏的工作开一代风气，允称小说评点的先行者。

就在此时，大思想家李卓吾也开始了对《水浒》的评点。刻于万历十九年的《焚书》中，已收有《忠义水浒传序》。次年，袁中道过访，见到卓吾正在评点《水浒》。由于李卓吾屡遭迫害，故此评本在其生前未能问世。万历三十年前后，容与堂刊行《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》。四十二年，袁无涯刊行《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》。这两部评点本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袁宏道《东西汉通俗演义序》记：

里中有好读书者，缄默十年，忽一日拍案狂叫曰：“异哉！卓吾老子吾师乎？”客惊问其故。曰：“人言《水浒传》奇，果奇。予每搯十三经，或二十一史，一展卷，即忽忽欲睡去，未有若《水浒》之明白晓畅，语语家常，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。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，则作者与读者，千古俱成梦境。”

可见李氏评点在读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。

这两部署名李卓吾的评点，从思想倾向、文学观点到文字风格，都有明显差异，当有一伪托者。论者多据《戏暇》与《书影》，认为容本为伪，其实不然。容本评语之思想及风格与卓吾他文相近，袁本则有明显相左处。且二书有若干

相同评语，容本问世在先，袁本难逃抄袭之嫌。另外，有吴观明本《三国演义》，可确定为叶昼托卓吾之名评点，其见解去容本《水浒》的评点远甚，并直署“梁溪叶仲子”，可见容本评点与叶氏无涉。当然，容本底稿数载沉埋，辗转流传，其中亦难免有他人笔墨杂入。

这两部署名李卓吾的评点，不论孰真孰伪，在当时都对“小说评点热”起了极大的加温作用。张鼎指出“卓吾死而其书重。卓吾之书重而真书、贗书并传于天下。”竟至于“卓吾书盛行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，几案间非卓吾不适。”^①在这样的风潮中，托名李卓吾的评点大量出现。如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》、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》等。这些评点，“套先生之口气，冒先生之批评”，^②但优孟衣冠，终无李卓吾那样精光四射的思想。兹举一例，《三国》十九回的总评：

“从来听妇人之言者，再无不败事者。不独一吕布也。凡听妇人之言者，请看吕布这样子何如？”这等平庸俗见，可为种种伪托评点思想风格的代表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托名之作对小说创作理论，几近盲聋，大大降低了评点自身的价值。

这一时期托名的小说评点，尚有借杨慎、徐渭、钟惺等人名义的。如，万历四十七年刊刻的《杨升庵批评隋唐两朝志传》、四十八年的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》、泰昌间的《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》等。前二种仅就刊刻时间论，作伪之迹已凿然可见。后一种则有李云翔序，称“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《封神》一册，……余不愧续貂”云云。评语分为初评、又评，似出钟、李二人之手，然细推敲，则语

① 《焚书》卷后

② 汪本珂：《续刻李氏书后》

意、笔墨均无二致，实为托名之黠伎。类此者尚多，以无甚价值，兹不列举。

本阶段中小说评点的大批涌现，原因主要有三点。一是八股文研究、批评的兴盛。《复社记略》云：“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，士既重于其事，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，因共尊师取友，多者数十人，少者数人，谓之文社。”文社的活动内容主要是互相观摩八股文，而其中的权威便有评点的责任，如张溥集复社成员的时文为《国表》，“丹铅上下，人人各尽其意。”^①这种品评方法自然影响到文学领域，从批评风气到具体方式都可见其痕迹。特别值得提到的是，以托名评点小说而著称的叶昼，曾合八郡文士，倡为“海金社”，至有“中州文社之盛，自海金社始”之说，可见时文品评与小说评点的关联。二是经史子集评点的兴盛。顾炎武指出：

评鹭之多，自近代始，而莫甚于越之孙氏、楚之钟氏。……俨然丹黄甲乙，衡加以经传。（钟惺）沈废于家，乃选历代之诗名曰《诗归》，其书盛行于世。已而评《左传》、评《史记》、评《毛诗》、好行小慧，自立新说，天下之士靡然从之。^②

孙氏即孙钊，万历二年进士，有《评经十六卷》，批点《诗》、《书》等，多着眼在词义句法之上。他还评点《昭明文选》，也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大谈行文之法、句势变化，在士人中很有影响。钟惺的评点除顾氏所列外，尚有所谓《钟伯敬先生批评九种》，计《汲冢周书》、《韩诗外

① 《梅村家藏稿》卷二十四

② 《日知录》卷十八

传》、《白虎通》等，系为鼓吹秦汉文而作。就数量言，钟惺不愧为卓吾身后的评点大家。因此，小说评点多托名于他，也是不足为奇的。第三点最为重要，就是明中、后叶心学的流行。“自弘治、正德之际，天下之士厌常喜新，风气之变，已有所自来，而文成以绝世之资，倡其新说，鼓动海内。”^①心学对明季思想解放运动是有促进作用的。王阳明讲：“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。”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，但在倡狂狷抑乡愿方面，在鼓励独立思索方面，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其后继者李卓吾更进一步提出：

夫所谓作者，……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初未尝案

古圣人以为是是非也。^②

这一思潮在学术上产生正、反两方面的影响。积极方面是批评之风大盛，理论上敢于创新；消极方面是自我作古，学风浮躁，作伪成风。小说之所以在这个时期被“抬起来”，与诗文分庭抗礼，小说理论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有长足的发展，就思想背景论，正是这种思潮的积极后果之一。而这一阶段小说评点普遍存在的鲜明的“重表现”的理论色彩，更是这一思潮的直接反映。

伴随评点方式的勃兴，人们对评点的认识也有所深化。如钟惺友人陈磐生在《与邓彰甫书》中提出：

批评圈点为时套滥觞，……所谓批评者，一则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，以剖千古不决之疑；一则援引商略，判然详尽，以自见其赅博。……倘语意平常，不如

① 《口知寻》卷十八)

② 《藏书·司马迁传》)

无批，轻薄率易，尤为可厌矣。^①

强调评点在思想、学术方面应有所创见。又如曹尊生《与陈开仲书》讲：“评史欲其尽，评诗欲其不尽。”对不同对象的评点提出了不同要求。这些反映了社会对评点的普遍关注，但评点的长足进步主要还体现于几部杰出之作的实践中。

这一时期长篇白话小说的评点，比较好的有李卓吾《水浒》评，袁刊《水浒》评，袁于令《隋史遗文》评与金圣叹《水浒》评。

李卓吾提倡狂狷精神，宣称：“论载道而承千圣绝学，则舍狂狷将何之乎？”^②这种狂狷精神贯穿于他的文学批评之中。他在评论《拜月记》时讲：“有此世界即离不得此传奇。肯以为然否？纵不以为然，吾当自然其然。”这种“自然其然”的态度是他本人评点小说的态度，也是明季小说评点的基调。卓吾独特的思想风格反映到他评点的风格上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如“尝笑天下忌才之人，狗也不值”。“不知强盗是知府，知府是强盗！”等，一个愤世嫉俗、狂放不羁的批评者的形象跃然于字里行间。小说批评自身有风格可言，当自卓吾始。

卓吾的《水浒》评点，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拓开了小说创作论的领地。卓吾之前，小说批评集中于社会功用一类问题，对于小说创作的理论问题，虽有人偶尔涉及，但不过浮光掠影而已。李卓吾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四点：对小说

① 《尺牍新钞》

② 《焚书·与耿司寇告别》

虚构性的辩证论述，对人物个性化的重视，提出了“以趣为主”的审美主张，提出了“化工肖物”的创作标准。这些理论观点在小说理论的发展史上都有石破天惊的意义。

李卓吾评点的《忠义水浒传》刊行后十年左右，苏州书种堂主人袁无涯又刊行了同样题署为“李卓吾批评”的《忠义水浒全书》。袁本卷首有署名杨定见的“小引”，称此书为杨氏所藏。但“小引”的可靠性也有疑问，不足为据，故此评点的作者只好存疑。

袁刊评点的风格与卓吾之评迥异，立论角度往往也大相径庭，然而别具特色，在当时的大量小说评点中仍不失为上乘之作。其与李评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风格。卓吾思想锐利，语言泼辣，袁评则冷眼旁观，语气和缓。二是着眼点。袁刊本的《发凡》自述评点宗旨：“有关于世道，有益于文章。”所以其评点不似卓吾着眼于根本性的文学理论问题，而是多从文章行文布局之法评论。如“先论后述，理事俱明”、“得制诰体”等。很明显，其眼界较卓吾窄狭，但这也造成了他另一面的长处，即把传统的文章学引入小说理论批评，对小说创作的某些具体规律及艺术技巧认识得较为细致了。袁刊评点的理论建树突出表现在对“情理”的重视，提出了“实以虚行”、写悬念等创作技巧，并开始注意到读者的心理效果。这些对金圣叹都有直接的影响，金批中不少命题，如“格物”、“缓急”、“惊险”及种种“文法”，都师承于此，甚至把某些批语一字不动地搬到自己的评点中，可见其倾倒之情。

把袁刊评点同卓吾评点对照来读，感受大不相同，其差异好比一个聪明的庸人同一个疏略的天才之间的区别。卓吾

的评点高屋建瓴，思想精光四射，却终有不辨骊黄之憾；袁刊评点规行矩步，虽未掣鲸鱼，却也颇拾得一些珠玑。真的卓吾评点与这伪托卓吾评点，相互补充，便成为金圣叹起跑的主要踏板。

崇祯十四年，苏州贯华堂刊金圣叹评点《水浒》问世，达到了古代小说评点的顶峰。金圣叹的评点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“几乎家置一编”，“效先生所评书，如长洲毛序始、徐而庵、武进吴见思、许庶庵为最著。”^①金批兼取李、袁二评之长，既有卓吾的大处着眼，又有袁评的细处推敲，故为明代小说评点的集大成者。他的光亮使其先辈黯然失色，以致“今人只知有金圣叹《水浒》评本，前乎此有叶毛通（指李、袁二评）则无闻矣。”^②

金圣叹在评点中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小说理论体系，尤其在创作论方面卓有贡献。他的小说创作理论大体可分为两部分。一部分是纲领性的论述，旨在揭示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、基本要求；一部分是具体的论述，探讨小说的人物、情节、结构各方面的问题。在后一部分，传统文章学的影响比较明显。

金批的理论建树，有两点尤可称道。一是他讨论小说戏曲艺术，不局限于作品本身，而是结合着欣赏过程，分析读者的心理效应。这种方法含有近代实验美学与文艺心理学的因素，可以说他是得风气之先的。如他在分析情节之节奏时，指出：“每每看书，要图奇肆之篇，以为快意。今读至

① 廖燕：《金圣叹先生传》

② 《茶香室续钞》

此处，不过收拾上文，寥寥浅语耳，然亦殊以为快者：半日看他两番大闹，亦费我心魂矣，巴到此处，且图个心魂少息。”^①类似的心理分析，在谈及悬念、缓急等问题时也有一些，亦甚精警。二是他的辩证思想。金圣叹的哲学思想杂糅《庄》、《易》与禅，甚富辩证因素。表现在小说评点中，就产生了很多辩证的理论命题。如“因缘生法”的理论，以“动心”与“无与”的对立统一来解释艺术思维，论情节时，分别提出“犯”与“避”、“急”与“缓”等对立统一的概念，等等，都闪现出机智而深刻的思想火花。

金圣叹的小说理论得力于他的思辨能力，同时也因其哲理思辨而受到局限。由于他受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，小说理论往往呈“头足倒立”的状态，如过份强调创作中主观因素的作用，过份强调小说的虚幻性，过份强调“文法”的意义等。

在这个阶段，还有一些文言小说如《世说新语》、《虞初志》的评点。这两部书均以汇评方式刊行。前者收有刘辰翁、王世贞、王世懋、李卓吾、凌濛初等人评语，后者收有李卓吾、袁宏道、钟惺、汤显祖、臧晋叔、屠隆等人评语。前者大体可信，后者则不尽可考，似有拉名人作招牌之嫌。这两部评点，虽间有一、二龃语，比起上述白话小说的评点，则犹燭火之于明月，故不作详述。

明清易代之际，士林风气与学术潮流都有明显的变化。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是，由师心任性走向崇实黜虚。顾炎武把明朝覆亡的责任归于心学：“以一人而易天下，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，古有之矣。王夷甫之清谈，王介甫之新说，

① 贯华堂《第五才子书》三回评

其在于今，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。”^① 费密亦讲：“（心学）何补于国？何益于家？何关于政事？何救于民生？学术盛坏，世道偏颇，而夷狄盗贼之祸亦相挺而起。”^② 这个时期的学者，虽然还有宗王、宗朱之分，但反对心学虚无蹈空、抨击泰州学派的“狂禅”作风，则几至众口一辞。而在顾炎武、王夫之、方以智等人的著述中，都比较明显地流露出唯物论的倾向。王夫之讲：“盈天地之间皆器矣。”顾炎武主张“以修己治人之实学”取代“明心见性之空言”。而颜元、李塨更是鼓吹“实学”不遗余力。其后，清王朝为了巩固统治，先是抬高程朱，贬抑陆王，继而提倡汉学，于是，黜虚崇实更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。这一变化影响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，小说评点自不能例外。

金批《水浒》《西厢》为小说、戏剧的评点又一次加了温。清初的小说多有评点，其中金圣叹的影响处处可见。如王望如评《水浒》，自称“吴门金圣叹……示戒之苦心犹未阐扬殆尽，余则补其所未逮。”实际上他的评语拖沓冗长，思想平庸，对小说艺术几乎不曾涉及，价值远不能与金批相比。又如《金云翘传》，题署为“贯华堂批评”、“圣叹外书”，实则为托名之作，也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。效仿金圣叹，而又能独树一帜，体现出时代精神变化的，是毛批《三国》与张批《金瓶梅》。

毛批《三国》，世人多认为出自毛宗岗之手，其实不然。毛宗岗之父毛伦在《第七才子书·总论》中讲：

① 《日知录》卷十八

② 《弘道书·圣门定旨两变序记》